

戏剧艺术学习资料

一九八〇年 第二期

(总第五十四辑)

甘 肃 省
文 化 局 剧 目 工 作 室 编

目 录

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同志有关言论摘要	
.....	(1)
建国以来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一些主要情况	
.....	(5)
√近一年多现实主义理论探讨综述.....	(42)
√现实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情况.....	(53)
√当前文艺理论中正在探讨的几个问题.....	(71)
√建国以来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	(95)
√关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争论的综述	(117)
文学，要关心九亿农民	
——《文艺报》编辑部召开农村题材创作	
座谈会记实	(128)
√文艺创作如何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	
——北京市文联创联部召开专业、业余作者	
座谈会	(141)
√怎样反映新时期的社会矛盾	
——本刊编辑部邀请首都评论工作者就《人到	
中年》进行专题讨论	(146)

√ 关于悲剧问题的一次学术讨论会	(164)
西省戏剧创作中的一些问题	(172)
苏、鲁、浙、沪部分戏剧工作者谈当前戏剧 创作中的问题	(176)
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简介	(183)
周扬同志在建国三十年全国美展获奖作品 北京地区发奖会上的讲话	(213)
周扬同志在音乐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18)

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

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同志有关言论摘编

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

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做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提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作家不让负责同志发表感想也不好，因为是负责人，言论就没有自由了？那不行。他们可以发表他们的感想，至于你采纳不采纳，或者是不是按他们的意见修改，你有你的自由。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那当然是另一回事，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作个别意见，可以不听。

刘少奇：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

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利去禁演。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这样很多作品就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了。作家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当然搞不出好作品来。这与党委领导有关。

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

现在我们要问问他：什么人给你那样大的权？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的结论，明天做那个的结论？什么人给了你这个权，可以把人家的作品五年不理？动员人家写了半年、一年，结果一分钟工夫，就否定完了？对人家的劳动为什么这么不重视？一定要人家改、非改

不可？！又是哪个给你的权？中央给你的？中央宣传部给你的？宪法上载有这些吗？都没有。昨天我对一位同志说：中央没有决定要审查文艺作品。你们写的政治论文，送到我那儿，我有时改几段，有时改几个字，或者提点儿意见，第二天一发表，我看有时候是吸收了我一些意见，有时候也没有吸收。吸收了我固然高兴，没有吸收也并不以为得罪我。因为作者有他的民主权利嘛！怎么能随便糟踏呢？作者不是你的马弁，你又不是军阀，可以对人唤之即来，挥之便去，……

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

写剧本要由作家负责任，要尊重作家的民主权利，不能够根据一个什么行政处长、一个党委书记、支部书记，或者别的什么人，也不要根据我这么个副总理，一言而决，就决定它的命运，不要这样。我们希望作者不要拒绝人家的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听，好的意见，或者反对的意见，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听。但是听了以后，怎么样改？改不改？愿不愿意改？这个由作家去决定，不要用强制的办法。

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

有的人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而是另外一种原则。这个原则，严格地说，是封建家长式的。说不戴帽子我也要戴他一顶。连资产阶级也还有点民主。只有封建家长制，那才不许可有民

主。所以，我们同志里头，不仅有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封建的东西。我们要肃清这些资产阶级的、封建的东西，真正回到马列主义、回到毛泽东思想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关系才能够彻底得到改善。最好是我们大家一道工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截长补短，大家一道，把创作繁荣起来，把文艺事业繁荣起来。

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本刊辑）

（原载引自《文艺报》编辑部编印的《文艺情况》1980年10期）

建国以来有关文艺 与政治关系问题的一些主要情况

第一部分 建国十七年中的主要情况

目前，我国文艺界正在开展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为了使这一讨论有更加扎实的基础，更好地同总结建国以来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以推动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认真地回顾一下历史，是很有必要的。为此，我们查阅了建国十七年中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献、讲话、文章和著述，兹将基本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概 况

翻阅了十七年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资料之后，我们总的印象是两点：

第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始终被认为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

革命任务”之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成为我国革命文艺遵循的一项根本原则。建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无论是三次文代会（分别在1949年7月、1953年9月、1960年7月召开）的重要文献，还是中央宣传、文化部门领导人的报告，或者新编高等院校文艺理论教科书，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报刊的许多社论和文章，都反复论述、申明了这一原则。尽管文艺界有些争论，如关于文艺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问题的论争，关于对文艺应当如何为政治服务的不同理解，对公式化、概念化根源的探讨，以及对文艺的特征、规律和党应该如何领导文艺的不同认识等，都牵涉到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但在文艺要不要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上，始终是一致的，都认为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使是许多后来被批判为在“实质”上是要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所谓“右派”（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者，实际上他们也都是一再申明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例如曾受到全国重点批判的秦兆阳（何直）同志，他在那篇著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文章中，就明白地写着：“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并着重指出：“特别是在我们这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在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代里，特别是针对着那些所谓艺术至上主义者、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者、人性论者等等，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劳动人民服务等原则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而“一切的非政治倾向都是对文学事业不利的”。重新审查历史的事实，应该

说当时的批判，包括一些领导人物和著名评论家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求是的精神的。

顺便说一下，在十七年中，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等这些提法，并没有严格加以区分，一般被理解为一回事，在文章中常常是交替使用的。六二年四月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联合起草的《文艺八条》就认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工农兵的利益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服务，为全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只是周总理1963年4月19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委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这样的区分：“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目前我国的革命、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为世界革命服务”。（《周恩来论文艺》第165页）这个区分也说明为工农兵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本来就是相一致的，只是各自角度不同，并无理论上的冲突。

十七年中，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基本原则，在不同的时期，它的具体内容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与人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政治形势本身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解放初期的二、三年中，比较强调文艺创作要“为政策服务”，同“任务相结合”，要“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各方面的运动”，要“赶任务”。为此《文艺报》编辑部开展了“关于‘赶任务’问题的讨论”。邵荃麟、王朝闻、肖殷等还就文艺为政策服务及‘赶任务’问题写专文加以阐述。这些篇目是：王朝闻：《为政策服务与公式主义》《主题与具体政策》（均见《新艺术创作论》50年4月

出版），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50年三卷一期），肖殷：《论“赶任务”》（《文艺报》50年四卷五期）。

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时，周扬同志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53年第十九期）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文学艺术战线上，必须把“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作为“长期的任务”之一。认为这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同“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有关；要求把“创造正面英雄人物”，“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作为文艺创作“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

五七年以后，又比较强调文艺工作“必须政治挂帅，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党的领导”；对于文艺创作的任务，茅盾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文艺报》59年第5期《创作问题漫谈》）中指出：“文艺要为生产和中心工作服务，这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要坚持贯彻”，并提出“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之说。

一九六〇年七月第三次文代会上，陆定一和周扬同志对为政治服务的内容又作了新的补充，除继续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之外，还强调要“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服务”。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中，又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后还提出“为农业建设服务”，“为农民服务”。

六三年以后，又进一步强调文艺担负着国际国内“双重的革命任务”。在国内任务方面，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63年1月1日）；一九六五年底，周扬在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见《红旗》66年第一期：《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中提出要“大写社会主义”，“大写英雄人物”。

第二，两条战线的斗争演变为一条战线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从所接触的材料来看，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党确实领导文艺界开展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通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以及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的批判等，不断纠正右的错误；同时对于领导和评论中的教条主义和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等“左”的倾向，也不断提出严肃的批评。

对“左”的倾向的批评，八年中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五二年至五三年：5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题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中，明确批评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出“这类作品，除了拾掇了一些口号和概念之外，空无所有”，“实际上却是取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正功用”。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周扬纪念

《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进一步指出创作上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很“严重”，“如不加以反对和纠正的话，就会大大地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到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时，周扬在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里，则又进一步把反对“概念化、公式化以及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提了出来；并对某些文艺部门“简单的行政方式”的领导，以及“从教条公式出发”，“粗暴的、武断的”文艺批评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些“助长了”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倾向。对这种“左”的倾向的严肃批评，成了第二次文代会一个重要的内容。

第二次高潮是五六年至五七年上半年：五六年二月底，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上的报告（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56年第五、六号）中，再一次强调要同“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作斗争”，要克服文艺理论、批评、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不是十分容易克服的东西”。这一时期，秦兆阳、陈涌、秋耘、敏泽、刘绍棠、周洁夫、于晴等先后发表文章，都对公式化、概念化表示不满，并进一步探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或“主要”、“重要”）原因，对理论指导上的“教条主义”、“庸俗的机械论”等，进行了集中的批评，强调要重视“艺术本身的特点”。但是，这个高潮刚刚出现，就被强行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57年第十四期《文艺报》，发表了荃麟的《斗争锋芒指向右派》一文。文章写道：“在目

前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文艺战线和其他思想战线一样，必然立即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右派，指向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党的文艺思想”。这样，上述那些反对教条主义、主张重视艺术本身特点的言论，很快地受到严厉的批判；从此，这一条战线也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了。六〇年七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再也没有提反“左”这一“长时期的任务”。此后，六一年和六二年，虽然对“题材问题”（见《文艺报》61年第三期《题材问题》专论）以及服务对象（见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等问题上的“狭隘化”的理解提出过一些批评，还曾拟定了《文艺八条》，但都未能产生多大影响，便受到了批判。

与此同时，“反右”的战线却不断加强，恶性发展，特别六二年以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严重混淆了是非，打击面越来越大，以至出现这样的怪现象：解放初还是文坛左派的人物，五七年一批批成了“右派”；五七年还是“反右”的领导者，六四年又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十七年一直是文艺战线领导和组织者的一些老同志，到文化大革命，也在“反修”、“反右”的大旗下，被当做文艺黑线的大小“头目”给打了下去，成为阶下囚。最后只剩下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派。

从两条战线到一条战线；又由一条战线走向极端；最后跌进十年浩劫的深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二、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

十七年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文艺必须为政治服

务这一原则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些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七个方面：

（一）是由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决定的。

文艺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它为基础所制约，又反过来为基础服务。这种反作用是通过政治来达到的。因为政治、法权、道德、文艺等虽然同属于上层建筑，但“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最接近于基础；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上层建筑的一切因素都通过阶级的政治达到反作用于基础的目的。文艺也不例外。

（二）是文艺的阶级性决定的。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文艺在客观上所固有的特性。既然如此，它就不可能对自己阶级的利益和命运漠不关心，而这种“关心”，又是通过对具体生活的形象描绘来实现的。因此，各个阶级对文学作品都十分重视，积极利用文艺作为宣传的手段，教育本阶级的成员，并影响其他阶级的人，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然也需要文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文艺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就集中地表现在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三）是作家的阶级性决定的。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作家都属于一定的阶级，他们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们创作中对素材的选择，对人物、事件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与评价等等，都是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的，因此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文艺武器，表现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本阶级服务。

(四)是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决定的。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结果。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政治又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文艺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政治。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或接受党的政治领导的文艺工作者，他必然要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这种生活和斗争又必然成为他的艺术创作的源泉，那么，他的作品将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也就是按照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而得出的自然结果。

(五)是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党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一九〇五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他着重提出：“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强调党不允许任何人宣传反党的观点，“假如它不能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服从党在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既然如此，无产阶级的文艺就不能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事业漠不关心，或者对于各个阶级一视同仁，而必须成为无产阶级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强大武器；革命的作家必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和党的事业，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自觉地、公开地站在党的立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六) 建国后文艺战线的斗争证明了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正确的。

文艺战线的多次斗争说明，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文艺问题上的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使文艺脱离革命的政治。教条主义者简单地认为只要有政治，就有艺术。他们的公式是政治即艺术。修正主义者的公式则是艺术即政治，这是使政治服从艺术，实际上就是使革命的政治服从于掩盖在艺术外衣之下的反革命的政治。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路线，必须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

(七) 从文艺发展的历史看，文艺为政治服务也是一种客观事实。

自从人类社会阶级对立的关系形成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文学史上的许多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在我国，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古已有之，并形成一个有力的传统。古典文论中有许多作家，如孔子、曹丕、刘勰、白居易、李觏、王安石、梁启超等，都曾明确指出并强调文艺要为社会政治服务，要能起到改变社会风习、道德的作用。到了现代，由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文艺家和资产阶级文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尤为尖锐和持久。

在文艺创作上也是如此，革命阶级的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反动阶级的文艺为反动政治服务。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革命爆发之前或之后），表现得特别明显、突出。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弥尔顿的创作，法国资产阶